

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的措施、效果与当代启示¹

王小元^{1, 2}, 徐志宏¹

(1.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2; 2. 江西理工大学 科技处,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中国共产党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中央苏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腐倡廉运动，建成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中国共产党在反腐倡廉过程中，通过抓宣传、办教育、立制度、树典型等有组织、有系统的具体措施，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艰辛历程。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初步探索了廉政文化建设道路，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路线，奠定了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组织基础。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对我国在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中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抓好学校廉洁教育、完善廉政制度和坚持惩腐扬廉等方面依然具有深远的启示作用。

【关键词】：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红色基因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 (2018) 04-0103-08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 1931 年 11 月 7 日在中央苏区的成立，中国共产党开启了局部执政的伟大实践。在这艰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开展了执政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在中央苏区反腐倡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探索了一条廉政文化建设的道路，这条道路在当时体系渐成、成效初显。习近平总书记（2017）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必须坚如磐石。^{[1]67}为此，中国共产党从首次局部执政的反腐倡廉实践中挖掘廉政文化建设的启示对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综观学界关于“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视角：

一是在整体把握和专门研究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基础上间接涉及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傅克诚等（2009）在论述中央苏区廉政建设（反腐倡廉）时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廉政文化建设的一些方面，如“财政制度”“审计制度”和“新闻舆论制度”等。^[2]程水栋和夏绪仁（2017）在专门研究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中也间接涉及了廉政文化建设。^[3]这些研究成果虽然都没有直接提出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的概念，但为进一步开展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理论铺垫。

¹【收稿日期】：2018-01-23；【修返日期】：2018-05-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自信视野下增强中国红色文化世界影响力研究（17BKS088）”；江西省艺术规划项目“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研究”（YG2014089）

【作者简介】：王小元，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江西理工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研究，通讯作者联系方式 wxyb2008@163.com；徐志宏，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研究。

二是将中央苏区廉政建设基本经验与当代廉政文化建设进行结合开展研究，逐步实现了从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研究向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研究的转化。李康平（2010）提出了苏区廉政建设经验能够运用于当代廉政文化建设的观点，并提出了苏区廉政文化资源的概念。^[4]张吉雄（2012）提出了苏区廉政建设具有廉政文化价值的观点。^[5]田延光和张宏卿（2014）提出了苏维埃时期的廉政建设实践对中国共产党人今天的廉政文化建设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的观点。^[6]这些成果为进一步研究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三是从宣传视角直接或间接研究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田延光（2014）从宣传视角研究了《组色中华》与中国共产党早期廉政建设的关系，虽然没有直接提及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的概念，但提出了宣传在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7]曾繁坤（2012）以新闻舆论宣传为视角，从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的环境与特征、主要形式、苏区社会记忆、当代启示与价值等方面对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进行了研究。^[8]

四是将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作为一个有组织、有系统的整体进行研究。陈始发和李立娥（2015）对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的机制和启示等问题进行了较好阐述，并提出了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是一个有组织、有系统地发挥每个人主体性和能动性，将廉政思想文化与廉政社会文化整合到生活中的系统工程的观点。^[9]

综上所述，总体而言关于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的“具体措施”论述还不够系统，对“当代启示”的阐述也不够深入，更没有结合中国共产党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关于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的效果评价方面基本上没有涉及。为此，本文试图从现有研究成果中吸取有益的成分，从具体建设措施开始，初步探索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的效果评价，并结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阐述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实践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深远启示。

二、中央苏区多管齐下，廉政文化建设体系渐成

廉政文化是指人们对于廉洁从政的理想信念、政治伦理、社会道德的总的看法和观念，包含与之相匹配的行为规范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和评价，是廉洁从政行为在文化和思想层面上的客观反映，也反映出一个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黄丽敏，2017）。^[10]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打击自身的腐败问题毫不手软，并以廉政文化建设为先导，开展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地艰苦卓绝地反腐倡廉运动。综观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时期廉政文化建设领域的探索与实践可以看出，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是一个有组织的，相对完整的系统工程。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以舆论宣传为先导，以学校教育为主渠道，以制度建设为保障，以典型人物为标杆，多管齐下，探索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廉政文化建设道路。

（一）通过办好《红色中华》等报刊为廉政文化建设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报刊、书籍、标语、墙报等形式进行廉政文化建设宣传，而其中最重要的形式就是报刊。1931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创办了《红色中华》，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创办的第一张中央铅印大报。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创办了《斗争》和《青年实话》等报刊。这些扎根中央苏区的报刊大多数通过以下形式向广大苏区干部群众注入红色基因，宣传廉政文化，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实践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

1. 刊载中央苏区政府开展反腐倡廉的方针政策 及时刊载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方针政策是进行反腐倡廉宣传的重要途径，也是教育广大苏区干部群众的重要手段。1932年3月2日，《红色中华》报发表了时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项英（1932）的文章《反对浪费严惩贪污》，文章针对万泰县等县政府机关的贪污浪费行为严厉指出：“对于这种随意浪费，我们要坚决地反对，如若继续不改的，就要用革命纪律来制裁……对于一切浪费经济，特别是贪污分子，都要给以严重的惩办。”^[11]这篇具有战斗檄文性质的文章传递了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坚定决心和意志。1934年1月4日，中央苏区反腐倡廉行动进入攻坚克难时期，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红色中华》报上又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训令指出，“为了严格惩治贪污及浪费行为，特规定惩罚办法如下：（一）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地位贪没公款以图私利者，依下列

各项办理之：（甲）贪污公款在 500 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丁）贪污公款在 100 元以下者，处以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12]训令同时明确列出了各种贪污浪费行为及其相应的惩处方式和力度。

2. 刊载反腐倡廉的案件线索。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常通过巡视发现问题，并将问题线索进行公布，为相关部门进一步查实问题提供依据。如 1932 年 6 月 30 日，《红色中华》刊载了题为《官僚腐化的永丰县财政部长》的文章，整篇文章深刻揭露了永丰县陈鸿烈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作为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他只会带着老婆闲玩，从没认真巡视过本职工作，严重脱离群众，官僚腐化十足。相关部门将文章内容作为一个重要线索，查处了这位官僚作风十足的县苏财政部长。在 1934 年第 31 期的《红星》报上刊载了《特科学校的贪污坏蛋》和《通信学校中的贪污分子》等文章；1934 年第 8 期《青年实话》还刊载了《做费贪污分子从少先队员中滚出去》等文章。

3. 刊载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重要成果。《红色中华》等报刊还经常通过刊载一些反映反腐倡廉的漫画，或者通过在“铁锤”“黑板”等栏目登载一些贪污腐败典型。1932 年 6 月 20 日，《红色中华》刊载了《端金县苏裁判部关于判决谢步陞枪决的判决书（第八号）》，判决书历数了谢步陞“十大罪状”，并指出“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号训令判决谢步陞枪决，并没收他个人的一切财产。倘若双方不服，在一星期的时间内可以向临时最高法庭上诉。”^[13]1934 年 3 月 29 日，《红色中华》报刊载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中字第 5 号）》，命令指出：“前任于都县苏主席熊仙壁领导与包庇贪污，私用公款做生意谋利，熊系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除批准人民委员会将其主席撤职外，并开除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交最高法院治罪。”^[14]

（二）通过抓好以学校为主阵地的廉政教育夯实廉政文化建设主渠道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了苏维埃大学和列宁小学等学校，促进了苏区教育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以苏区学校为主阵地，通过各种形式抓好廉政教育，体现了中央苏区廉政教育的人民性、生活化和社会化，初步形成了“不想腐”的氛围。

1. 强化中央苏区学校廉政教育的人民性。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开展学校廉政教育的首要工作就是强化人民性。中央苏区廉政建设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成就，最根本原因就在于秉持了“人民主体”（刘晓根，2015）^[15]这一核心理念。毛泽东（1991 年版）经常深入中央苏区学校了解廉政教育情况，他反复叮嘱苏区的各级各类干部：“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16]各学校通过传唱红色歌谣和排练红色戏剧等日常教育形式，帮助苏区干部树立马克思主义人民本位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将廉政文化的红色基因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各种廉政教育形式中，使党的干部逐渐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逐渐增强对人民群众的认同感，拉近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2. 推进中央苏区学校廉政教育生活化。中央苏区时期，学校和各级机构非常重视廉政教育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第一、苏区文艺工作者通过戏剧等形式将贪污分子和廉政建设楷模的形象搬上舞台，让苏区群众分清廉政和贪腐，趋廉避贪。中央苏维埃剧团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创立的重要剧团，也是当时廉政文化建设的主力军。当他们得知苏区部分群众对苏维埃政府不满意，埋怨甚至咒骂那些苏维埃机关的“坏蛋”时，他们组织人员编排戏剧《伏铁锤》，专门讽刺和打击那些躲在苏维埃机关内的贪污腐化分子，受到了苏区群众的热烈欢迎。第二、中央苏区学校引导干部群众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唱廉政歌曲进行廉政教育。中央苏区时期，学校非常重视传唱革命歌曲，他们经常带领学员和干部群众以唱歌的形式配合各种廉政教育，大家非常喜欢唱具有廉政色彩的革命歌曲，上下课、走路、出操、晚点名、吃饭前等场合，都能够听到激情洋溢的歌声。第三、中央苏区学校的干部职工与其他干部群众一起在房子的内外都贴上“反对一切贪污腐化”等标语，用以教育那些意志薄弱的苏区干部。通过这些深入人心的廉政教育形式，苏区干部群众将廉政文化建设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紧紧联系在一起，提高了廉政文化建设的实效性。

3. 引导中央苏区学校廉政教育社会化。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各级政府非常重视组织苏区干部和群众参加贪污分子公审，并希望通过公审来增强干部廉洁自律，提高群众检举腐败的积极性。1934 年 3 月 25 日，中央苏区审判熊仙壁时，“得到

通知来各机关干部 500 多人。此外，还有附近工厂、企业的干部职工，还有丢下耕牛、手脚没擦干净的田野上的农民。整个大礼堂被挤得水泄不通”（彭诗光，2009）。^[17]通过组织干部群众观看公审，既丰富了群众生活，教育了干部群众，又增强了中央苏区的凝聚力。

（三）以建立健全廉政建设制度为突破口构建廉政文化建设的保障机制

中央苏区时期，为推进廉政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相对完善的制度，确保整个反腐倡廉进程基本按照法律和制度依法进行，初步探索了“不能腐”的制度构架。

1. 加强宏观制度建设，确保反腐倡廉常态化。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非常重视制度建设。早在 1926 年 4 月，刚刚成立不到五年的中国共产党就将《洗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这一通告向全体党员正式颁布，中国共产党从此便有了惩治腐败的纲领性文件。同年 8 月 4 日，中国共产党将这个通告分发到各地党部，并特别强调：“在这革命潮流仍在高涨的时候，许多投机腐败的分子均会跑到革命队伍中来……所以应该坚决清洗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奋斗，才能坚固我们的营垒，才能树立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中央档案馆，1989）。^[18]党中央希望各级党部接到通告后立即执行，并将结果具报中央。此后，中国共产党初步建立和健全了中央苏区党政监督和检查机制，如《工农检察部的组织条例》（1931 年 11 月）、《中央巡视条例》（1932 年 3 月 12 日）和《工农检察部控告局的组织纲要》（1932 年 8 月 13 日）等。通过一系列建立和完善制度的举措，中国共产党建立了群众性民主监督机制、执政党监察机构、审判机构、监督检举机构、苏维埃监察机构和社会舆论监督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了监督机制，使党员干部的执政行为基本在监督之下，形成了良好的监督和约束氛围，强化了党员干部的自律行为，确保中央苏区廉政建设常态化进行。

2. 加强微观制度建设，不给腐败分子可乘之机。在注重宏观制度建设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规范财政制度，严格财政纪律。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预算、决算制度，审计制度，统一税收和统一会计制度等方式，从经济层面遏制腐败产生。例如：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财政条例》（1931 年 12 月），这是中央苏区第一部全国性财政法规。1934 年 2 月 20 日，毛泽东还签署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这是中央苏区第一部全国性的审计法规。这些《条例》的颁布，完善了相关制度，最大限度地遏制了腐败的发生。

（四）通过树立正反两方面的典型强化廉政文化建设的导向功能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既查处贪污腐败的官员，也积极表彰廉洁奉公的好干部，并通过树立典型来引导苏区干部勤政廉政，最终形成了苏区干部好作风。

1. 通过刊载正面典型传递正能量，对广大干部进行了廉政教育，初步培养了“不想腐”的自觉。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开展以来，苏区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得到极大提高，这与一些高级干部的典型示范分不开。1934 年 3 月 20 日，《红色中华》登载了左觉民、陆定一、余长生、邓颖超等 23 位干部关于开展节省运动的亲笔签名信，信中提到“我们是从白区来的，我们在苏区没有分田，但是，我们围着革命战争，使我们能在持久战中取得彻底胜利，愿意：一、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战士吃饱，好打胜仗；二、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新战士穿。”^[19]这封信在苏区反响强烈，使中央苏区的干部和人民对节省运动的意义有了深刻认识，在中央苏区节省运动和支前行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中央苏区的反腐倡廉运动和廉政文化建设产生了积极影响。

2. 通过刊载贪污腐败分子的实例，震慑了一些潜在的贪腐分子，初步形成了“不敢腐”的氛围。

《红色中华》等报刊还登载了不少有贪污腐败情形的干部的腐败情况。1934 年 3 月 13 日，《红色中华》报刊载了《中央组织局给邓湘君同志的警告》。该材料认为：“虽然数目不大但这些错误的事实，是布尔什维克党不应有与不容许的，决定给予

邓湘君同志书面警告。”^[20]此外，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多种形式宣传了如何惩处谢步陞、左祥云、唐仁达和“于都事件”等个人案件和集体案件，对其他潜在的腐败分子进行了有效震慑。

三、廉政文化建设在中央苏区不断发展壮大过程中成效初显

（一）初步探索了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刚刚登上执政舞台，就面临着复杂的反腐倡廉形势和任务。如何在反腐倡廉运动中培育红色基因，形成廉政文化，确保减少和根治腐败是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难题。中国共产党通过几年的探索，逐步探索了廉政文化建设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懂得了在运用新闻媒体时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推进廉政文化建设实践时必须抓好学校廉政教育这一主渠道，必须重视建立健全廉政制度的重要保障作用，并真正看到了挖掘正反两个方面的廉政建设典型对提高廉政文化建设实效性的重要意义。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廉政文化建设道路的坚定而又艰辛的探索，为中国共产党后来在延安时期乃至全面执政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建设史上的宝贵财富。

（二）初步形成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众路线

中国共产党通过廉政文化建设，提高了苏区干部的宗旨意识，不少干部积极为苏区群众办了实事，苏区群众得到了实惠。普通群众内心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产生了高度认同感。刘长秀是中央苏区时期兴国县长冈乡的普通军属，过去无田无房，生活相当困难。土地革命后，中国共产党给刘长秀分田分房，刘长秀非常感激政府。1931年，长冈乡夏荒缺粮，她家生活困顿，村苏主任亲自背米送给她。1932年，乡苏又到100多公里外的公路县买便宜米供给刘长秀等困难群众。1933年11月，毛泽东去长冈乡做调查遇上了刘长秀。刘长秀虽然不认识毛泽东同志，但想起中国共产党干部的勤政爱民和廉洁奉公，她情不自禁地向毛泽东同志说出了心里话：“共产党真正好，什么事情都替我们想到了”。正是因为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的开展，中央苏区建立了“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绝大部分党的干部能够做到廉洁奉公，群众得到了更多实惠，中国共产党得到了群众的真心拥护，不断厚植了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群众基础，党的群众路线初步形成。

（三）奠定了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组织基础

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使中央苏区反腐倡廉运动有了理论支撑。中国共产党及各级苏维埃政府从舆论宣传、学校廉政教育、建立健全制度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反腐败机制，初步构建了“不想腐”“不敢腐”和“不能腐”的机制。中国共产党将一批腐败奢侈无法挽救的干部清洗出了干部队伍，对一些有腐败苗头的干部则进行了纯洁思想的教育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的廉政建设，中央苏区的干部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更加纯洁，整体素质上得到极大提高，确保留下来的党员干部能够继续为广大群众服务（王小元和张璐，2016）。^[21]中国共产党这种“防尘扫埃”的举动也换来了“地净天蓝”的局面，中央苏区出现了“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同时，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使一大批党的干部进一步坚定了革命意志，强化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为中国共产党取得长征胜利乃至全面执政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四、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经验在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进程中启示深远

为进一步巩固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形成的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习近平总书记（2017）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1]67}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理念，坚定不移推进“打虎”“拍蝇”和“猎狐”等行动，努力建成“新的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在新时代反腐败斗争进程中，廉政文化建设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当前，中国共产党必须继续认真思考中央苏区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实践，传承其红色基因，并科学借鉴其历史经验，进一步推进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

（一）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是新时代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首要问题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借助《红色中华》等媒介，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推进了廉政文化建设。当前，随着国家经济与社会的全面进步，网络技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中国社会进入了“自媒体”和“全媒体”时代，报纸（含电子版）、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依然是新闻媒体的主阵地。但是，网络、微信、微博、QQ 等新媒体越来越发挥着重要作用，任何人都可以是新闻的发布者，任何网络形式都可以成为新闻的发布方式。这既提高了新闻传播和舆论监督的效率，也增加了新闻监管的难度。但是，面对媒体传播领域的深刻变革，中国共产党更应该解决舆论导向这一首要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一定要继续发挥新闻媒体的积极引导作用，通过媒体把中国共产党反腐败斗争的政策、措施、效果、动向、经验等信息及时向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反馈，消除疑惑，增强共识，牢牢掌握话语权，使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始终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完善中国共产党廉政文化，夺取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当前，中纪委（监察部）网、中国廉政监察网、搜狐、凤凰等网站，《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检察日报》及其网络版，城市主干道、社区和乡村的墙报、板报等都在及时发布中国反腐败的信息，在廉政文化建设中发挥了正确的舆论引导作用。同时，中国共产党还要通过各种形式向全世界讲好中国廉政建设故事，引导全球舆论正确看待中国反腐败斗争，为中国的海外“猎狐”行动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二）做好以学校为主阵地的廉洁教育是推进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各级各类学校为主阵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廉政教育，丰富了廉政文化建设的内容，促进了中央苏区反腐倡廉建设。习近平总书记（2017）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广大青年只有持续提高廉洁意识和廉洁意愿，中国廉洁政府才能够真正实现。因此，推进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必须抓好学校廉洁教育，把中国青年培养成为具有廉洁意识和廉洁意愿的新青年。通过更新教育内容、改进教育方法、丰富教育手段等方式，让学生从小学接受和强化廉洁教育意识，在中学阶段理解廉洁教育内容和重要性，在大学阶段逐步养成廉洁自律习惯。通过抓好学校廉洁教育，将预防腐败关口前移，增强学生廉洁意识，提高学生廉洁本领，为社会输送廉洁人才，培养廉洁氛围，为学生往后廉洁从政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抓好学校廉洁教育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是新时代推进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抓手。

（三）完善廉政制度是推进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的核心保障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健全财经、政治和法律等制度，初步培育了廉政文化建设的红色基因，有效促进了廉政文化制度化建设。在十八大以来的治国理政实践中，红色基因显示出其在国家治理中的当代价值（肖文燕和罗春喜，2017）。

^[22]当前，廉政文化建设作为新时代治国理政的主要组成部分，理应传承中央苏区时期廉政文化建设的红色基因，将廉政文化建设与制度建设结合起来，并融入我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社会制度和生态文明制度中，让廉政文化的红色基因在“五位一体”的构架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新时代推进廉政文化建设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要制定和完善法律。通过完善法律提高法治思维，将廉政意识融入干部言行举止，促进干部“不敢腐”。一方面从宏观上要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另一方面，从微观上要优化执法环境，减少执法阻力，提高执法效率。第二、要深化体制改革。一方面要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组建从国家到县的四级监察委员会，并将监察委员会同党的纪律检察机关实现合署办公。201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颁布为新时代深化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法律保障。另一方面改革审计管理体制，完善统计体制。第三、要贯通监督，增强监督合力。在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要通过不懈努力，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习近平，2017）。^{[1]68}通过进一步规范财经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将廉政文化的基因深深植入党员干部脑海里，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使制度建设在新时代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廉政建设实践中继续发挥明显的作用，并通过健全廉政制度为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提供核心保障。

（四）坚持惩腐扬廉是推进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的根本遵循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褒扬廉洁楷模，严惩贪污腐败分子，教育了苏区广大干部和群众，极大地推进了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真正养成一种‘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张宏卿，2017）。^[23]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向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要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的伟大号召。同时，习近平总书记（2017）在十九大报告中还指出：“不管腐败分子逃到哪里，都要缉拿归案、绳之以法。”^{[1]67}为此，中国共产党要继续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展反腐败斗争，毫不手软地严惩贪污腐败分子。第一、在国内继续打“老虎”和拍“苍蝇”。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及时向人民群众揭露和“拍打”了一批贪腐官员，震慑了腐败分子，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显现。第二、在国际上，要坚持“为官不廉者，虽远必诛”的原则，继续开展“猎狐”行动，将潜逃海外的贪官押回国内接受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的审判。通过这些“典型腐败案例”有效警示党的干部要勤政爱民和廉洁自律。第三，中国共产党要通过树立和激励廉洁楷模，力争做到不让遵纪守法、廉洁奉公的好干部吃亏，不断在廉政文化建设实践中发现、培养和提拔经得起考验的廉政楷模，为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提供精神依托。在实践中要以《杨善洲》等红色电影为素材，继续将中共云南保山地委原书记杨善洲等一批在廉政建设过程中深受爱戴的“廉政楷模”广为宣传，为当前廉政建设树立真正的标杆，增加正能量。通过“廉洁”和“腐败”两个方面典型的对比，为新时代廉政文化建设提供根本遵循。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 [2] 傅克诚, 等. 中央苏区廉政建设[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 [3] 程水栋, 夏绪仁. 中央苏区的廉政建设经验及其当代启示[J]. 江西社会科学, 2017, (7): 215-221.
- [4] 李康平. 论苏区廉政经验在当代廉政文化建设中的运用[J]. 政治学研究, 2010, (2): 116-126.
- [5] 张吉雄. 论中央苏区反腐防腐实践的廉政文化价值与启示[J].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2012, (11): 61-63.
- [6] 田延光, 张宏卿. 中央苏区时期的廉政实践与经验启示[J]. 江西社会科学, 2014, (6): 126-130.
- [7] 田延光. 《叙色中华》与中共早期廉政建设[J].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 (5): 111-115.
- [8] 曾繁坤. 中央苏区时期廉政文化建设中的舆论宣传研究[D]. 南昌: 南昌航空大学, 2012.
- [9] 陈始发, 李立娥. 中央苏区廉政文化建设机制探析[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5, (2): 97-105.
- [10] 黄丽敏. 论廉政文化与廉政教育的关系[J]. 改革与开放, 2017, (7): 2-4.
- [11] 项英. 反对浪费严惩贪污[N]. 红色中华, 1932-03-02 (06).
- [12] 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N]. 红色中华, 1934-01-04 (02).
- [13] 瑞金县苏裁判部关于判决谢步陞枪决的判决书(第八号)[N]. 红色中华, 1932-06-02 (05).
- [14] 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中字第5号)[N]. 红色中华, 1934-03-29 (09).

-
- [15] 浏晓根. 人民主体：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核心理念[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5, (4): 197-201.
- [16]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139.
- [17] 彭诗光. 中央苏区反腐肃贪实录[M].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9: 330.
- [18]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G]. 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282-283.
- [19] 中共中央机关外籍同志给本报节省运动号召的回答[N]. 红色中华, 1934-03-20 (03) .
- [20] 中央组织局给邓湘君同志的警告[N]. 红色中华, 1934-03-13 (03) .
- [21] 王小元, 张璐. 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历史作用[J]. 党史文苑, 2016, (1): 31-33.
- [22] 肖文燕, 罗春喜. 习近平的红色情怀与治国理政视野下的红色基因[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7, (6): 97-103.
- [23] 张宏卿. 苏区时期的党内巡视制度[J]. 湖湘论坛, 2017, (6): 83-90.